

伴隨高齡化而來之所得差距擴大對日本經濟影響之研究與對我國之啟示

經研處

高超洋

摘要

日本於 1994 年進入高齡社會，所得差距（最高 20% 家庭與最低 20% 家庭之所得差距）即呈擴大趨勢。2007 年再邁入超高齡社會，加上戰後嬰兒潮開始退休，所得差距加速擴大而影響經濟成長動能。

2021 年我國所得差距創近 9 年來最大；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亦創近 10 年來最高，反映所得差距似有擴大跡象。2025 年我國亦將邁入超高齡社會，且將伴隨史上最大退休潮。若高齡化現象導致所得差距加速擴大，恐不利經濟之健全發展。日本伴隨高齡化現象而來之所得差距擴大經驗，及其因應對策，值得深入研究與借鏡。

（一）日本之所得差距擴大與高齡化現象密切相關

日本自 2007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以後，所得差距較大的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快速增加，促使吉尼係數及五等分所得差距倍數均加速上揚。此一現象與美國因階層間之僵固性造成之所得差距擴大，並不相同。而近年日本青壯年齡層所得差距亦出現擴大跡象，則與非正式僱用之工作型態大幅增加有關。

（二）COVID-19 疫情導致日本所得差距擴大問題惡化

過去 20 年在全球化、技術革新及非正式僱用等三大趨勢快速發展之下，中、低所得階層之貧窮化，與食品、能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同時發生，發生所謂「壓榨通膨」(screwflation)現象。此一現象亦導致日本中、低所得家庭之實質所得下降，加重高齡化現象下所得差距擴大之不利影響。2020 年伴隨 COVID-19 疫情之發展，股票市場與實體經濟之落差，以及行業別間之落差，導致經濟呈現「K

型」復甦之兩極化現象，低所得階層與高所得階層之處境恰好相反，低所得者愈貧窮，高所得者愈富有，導致所得差距擴大問題惡化。

（三）日本所得差距擴大主要經由購買力分配不均影響經濟成長動能

所得差距擴大主要係透過影響社會穩定、購買力分配、教育機會及投資環境等四個途徑，對經濟成長動能產生不利影響。日本主要因高齡者快速增加且所得大幅縮減而影響購買力分配，導致民間消費持續疲弱不振而影響經濟成長動能。

（四）結語與對我國之啟示

長期以來日本政府致力改善社會福利制度與租稅制度之所得重分配功能，惟亦影響資源配置效率與社會公平，並導致財政狀況嚴重惡化。一般歲出中社會福利相關費用之占比由 2000 年之 35%擴大至 2023 年之 51%，未來運用社會福利矯正所得差距之能力愈來愈受到限制。因此，近年日本政府轉而積極運用尊重市場機制之事前分配（pre-distribution）政策，來減緩所得差距擴大速度。例如，改善高齡者及婦女之就業能力（employability）及環境、強化青壯年勞工之技能再培訓（reskilling）教育、敦促企業遵循「同工同酬指南」改善非正式僱用之差別待遇以調整市場機制（structuring markets），以及擴充個人小額投資免稅制度（NISA）協助中產階級擴大金融資產所得。

我國之高齡化現象正來勢洶洶，若所得差距因而加速擴大，恐影響未來經濟成長動能。以下，擬根據本文之分析，提出以下四點建議供參：（1）宜事先推估超高齡社會及史上最大退休潮對台灣民間消費之可能影響，俾便擬訂因應對策；（2）台灣高齡者勞參率仍低，需致力改善就業能力及環境，激勵自發性延長就業，緩和對就業供給面及消費需求面之制約；（3）後 COVID-19 時代生活必需品價格高漲，可借鏡日本將政策重點聚焦協助中小企業加薪，以緩和對低所得階層

生活之衝擊；(4)台灣受 COVID-19 疫情影響薪資 M 型化更加嚴峻，宜加強支援服務業技能再培訓，防範青壯年所得差距惡化。

目次

壹、前言.....	1
貳、高齡化現象係導致日本所得差距擴大之主因	2
一、邁入超高齡社會後日本之所得差距加速擴大	2
二、近年高齡者所得差距縮小，惟青壯年齡層卻有擴大跡象	4
參、COVID-19 疫情造成日本之所得差距再度擴大	7
一、兩類型的落差擴大導致所得差距惡化	7
二、疫情對高所得與低所得階層產生非對稱性之影響	9
三、後 COVID-19 時代物價高漲對低所得家庭之影響更大	10
肆、日本所得差距擴大對經濟產生制約及其因應對策	13
一、所得差距擴大主要透過四個途徑影響經濟成長動能	13
二、IMF 及 OECD 研究指出所得差距擴大將不利經濟成長	14
三、日本所得差距擴大導致民間消費持續疲弱而影響經濟成長 動能	15
四、日本採取因應措施降低所得差距擴大以促進經濟均衡發展	16
伍、結語與對我國之啟示	24
一、結語.....	24
二、對我國之啟示與建議.....	25

伴隨高齡化而來之所得差距擴大對日本經濟影響之研究與 對我國之啟示

壹、前言

日本於 1994 年進入高齡社會後，所得差距（最高 20% 家庭與最低 20% 家庭之所得差距）即呈擴大趨勢。2007 年再邁入超高齡社會，所得差距加速惡化。2013 年安倍首相實施「安倍經濟學」除大規模執行財政及貨幣政策，以促進民間投資創造就業機會之外，同時積極實施激勵高齡者就業政策，所得差距反轉縮小。惟 2020 年伴隨 COVID-19 疫情之發展，低所得階層與高所得階層之處境恰好相反，低所得者愈貧窮，高所得者愈富有，導致所得差距擴大問題再度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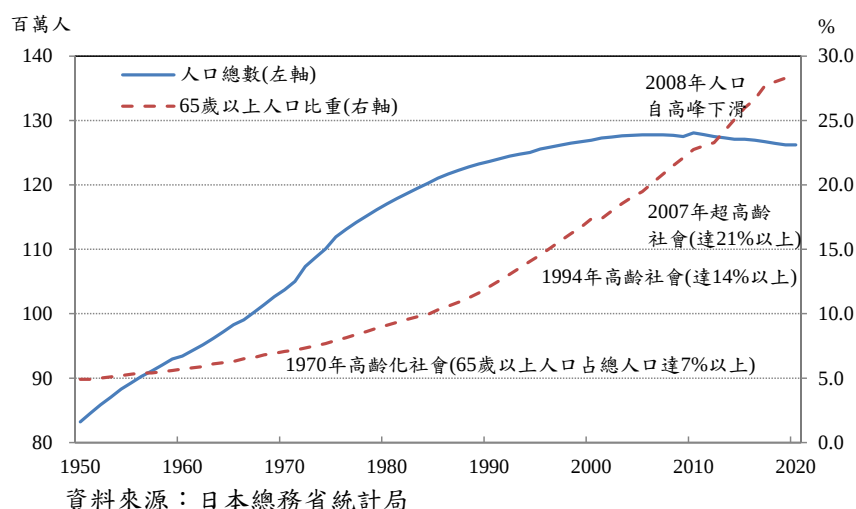
我國於 2021 年之所得差距，由 2020 年之 6.12 倍增至 6.15 倍，不但持續 3 年上揚，亦創下近 9 年來最大；吉尼係數亦達 0.341，創近 10 年來最高，反映所得差距有加速擴大之跡象。2025 年我國亦將邁入超高齡社會，若所得差距擴大恐將不利未來經濟成長動能。

日本伴隨高齡化現象而來之所得差距擴大之經驗，及其因應對策，值得深入研究，俾便及早綢繆因應對策。本文共分五節，除本節為前言外；第貳節分析日本進入高齡社會後所得差距擴大之現象；第參節探究 COVID-19 疫情造成所得差距再度擴大之原因；第肆節則檢討所得差距擴大的趨勢對經濟成長動能產生制約之途徑，以及因應對策；第伍節為結語與對我國之啟示。

貳、高齡化現象係導致日本所得差距擴大之主因

日本伴隨人口高齡化現象（圖 1）¹，所得差距較大的高齡者人口比重快速增加²。因此，即使青壯年齡層之所得差距不大，全體社會之所得差距亦會被持續拉大。觀察日本所得吉尼係數之走勢³，1990 年代初期仍大致維持平穩，惟 1994 年進入高齡社會之後即呈現明顯上升之趨勢。

圖 1 日本人口高齡化現象日益嚴峻



一、邁入超高齡社會後日本之所得差距加速擴大

依據厚生勞動省估算之所得吉尼係數（圖 2），以及總務省估算之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圖 3），均顯示日本自 2007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以後，所得差距呈現加速上揚之趨勢。

¹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定義，65 歲以上人口為老年人，當老年人口占總人口達 7% 以上，這個社會便稱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達 14% 以上，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達 20% 以上，稱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² 本報告之所得概念，係參考厚生勞動省之「所得再分配調查」之定義，指每戶之最初所得。日本有關所得統計對所得之定義包括：（1）最初所得＝工作收入＋利息、股利及租金等財產所得＋私人給付（企業年金、人壽保險金等）；（2）修正最初所得＝最初所得＋社會保障給付（公共年金、醫療、照護及育兒等現金給付）；（3）課稅後所得＝最初所得＋社會保障給付－稅金（所得稅及住民稅）；（4）重分配所得＝最初所得＋社會保障給付－稅金－社會保險費等。

³ 吉尼係數為測量洛倫滋曲線（Lorenz Curve）與完全均等直線間所包含之面積對完全均等直線以下整個三角形面積之比率，係數愈大表示所得分配不均等的程度愈高。其中洛倫滋曲線係以橫座標為人口數量累積百分比，縱座標為所得累積百分比，將實際所得資料以此對應描繪出之曲線。由於吉尼係數衡量所得變化狀況，內含資訊量及代表性較高，不易受極端值影響，為國際間最常用之指標。

圖 2 日本之所得吉尼係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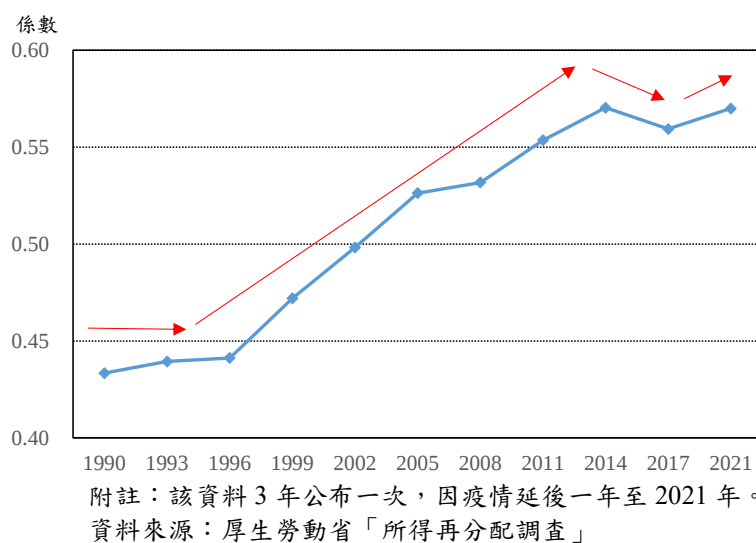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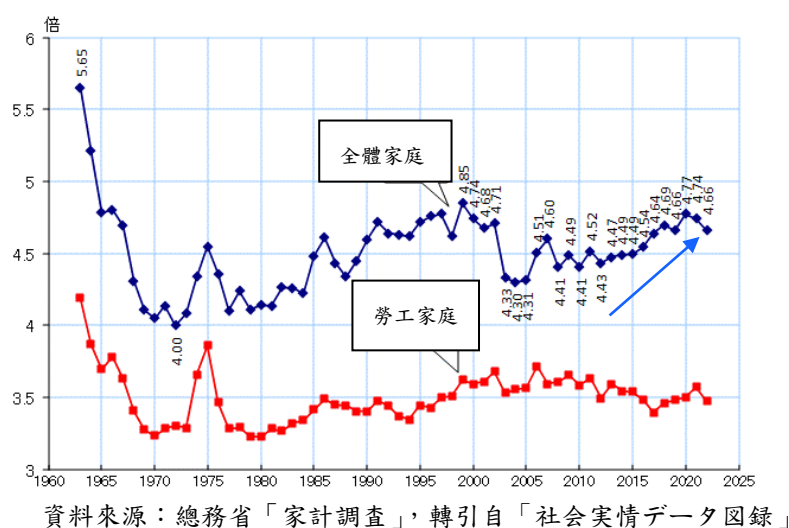


圖 3 日本之高所得家庭對低所得家庭之所得倍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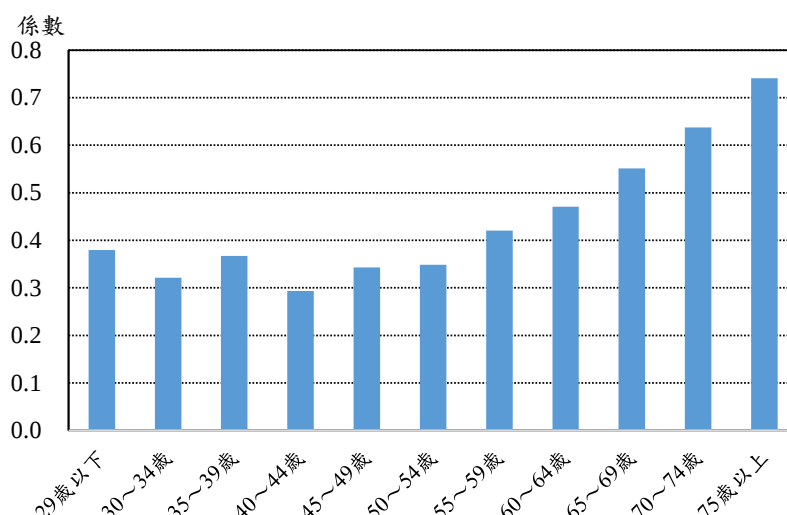
從圖 4 觀察可知，高齡化現象係導致日本所得分配差距擴大之主因，主要係因家庭主要經濟來源之戶長年齡別階層之所得差距，往往隨著年齡增加而呈現擴大⁴。因此，即使青壯年齡層之所得差距不大，惟伴隨所得差距較大的高齡者增加，全體社會之所得分配差距會因此而拉大，而此一現象與美國所得差距擴大之原因並不相同⁵。美國之所

⁴ 除日本之外，南韓亦是因高齡化現象導致所得分配差距惡化之典型例子，其 65 歲以上老人之重分配所得吉尼係數為 0.422，在 OECD 國家是第 2 高。參考世界民報網站「韓國 65 歲以上所得不平 OECD 國家第 2 差」乙文，該文係引用南韓勞動研究所發表之「高齡層僱用結構變化和所得不平均報告書」之資料。

⁵ 參考井上誠一郎 (2020)。

得差距擴大主要因各所得階層間之僵固性，使得貧富階層之差異無法透過所得成長的內在動力，以及外在行為而自動調節改善⁶。另外，與富人所得於經濟復甦期間快速成長，以及中低所得者之財富因經濟衰退之嚴重衝擊而大幅流失亦相關。

圖 4 日本各年齡層之吉尼係數（2021 年）



附註：該資料 3 年公布一次，因疫情延後一年至 2021 年。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所得再分配調查」

二、近年高齡者所得差距縮小，惟青壯年齡層卻有擴大的跡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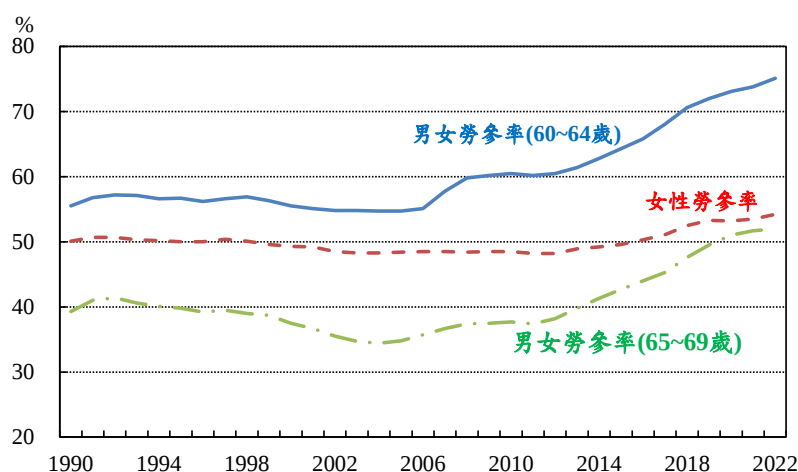
2014 年日本所得吉尼係數出現反轉下滑之現象（圖 2），主因安倍晉三首相實施「安倍經濟學」，於 2013 年修改「高齡者僱用安定法」，將勞工退休年齡由 60 歲延長至 65 歲，並新增對 65 歲至 70 歲的高齡者之就業確保措施；為激勵企業僱用高齡者，積極提供助成金與租稅優惠措施⁷，確實發揮了提升高齡者勞參率之效果（圖 5）。另外，在積極擴大財政政策，以及大規模寬鬆貨幣政策之背景下，扭轉

⁶ 參考連欣儀 (2014)。

⁷ 日本政府促進高齡者就業之助成金與租稅方面之優惠措施包括：(1) 為促進 65 歲以上高齡者之就業提供助成金，雇主通過僱用高齡者可獲得補助；(2) 為改善高年齡者之就業條件及工作環境而提供助成金，這使雇主能夠得到改善高齡者待遇之支援；(3) 租稅方面的優惠措施，65 歲以上員工的薪酬總額可被排除在事業所稅之課稅標準之外，以及排除 65 歲以上員工後企業的員工總數不超過 100 人，則可能享受事業所稅之免除等。

了超強的日圓匯率走勢，以及持續疲弱的股價。影響所及，日本企業增加投資，而積極將生產基地移至海外之趨勢亦出現緩和的跡象，創造了許多新的就業機會，就業人數因而大幅增加近 500 萬人⁸。

圖 5 日本高齡者及女性勞參率之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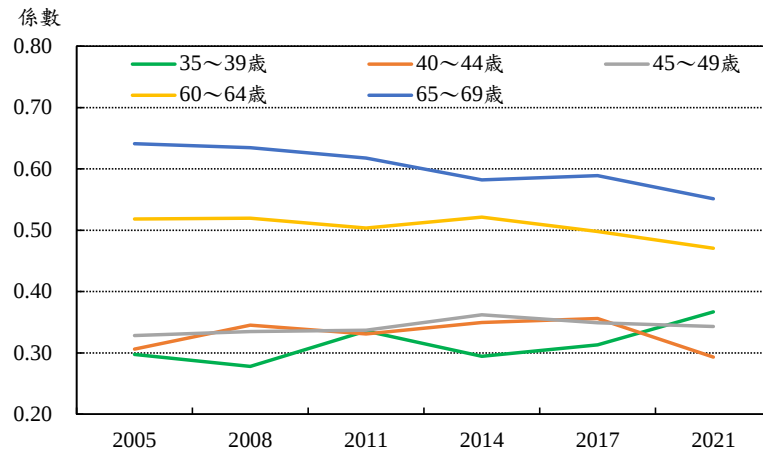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總務省統計局

在激勵高齡者就業政策之下，2012 年以來日本高齡者（60~69 歲）所得吉尼係數明顯下滑（圖 6），55~64 歲男性之非正式僱用情況亦明顯改善（圖 7）。惟青壯年（35~39 歲）齡層所得吉尼係數卻有上升的跡象（圖 6），主要與男性青壯年齡層（25~54 歲）之非正式僱用增加相關（圖 7）；日本女性結婚後（35~64 歲）復出就業之情況增加，惟長期以來仍以非正式僱用型態居多（圖 8）。根據厚生勞動省之「2022 年版薪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報告書」，同一工作內容，非正式僱用勞工之薪資水準仍僅正式僱用勞工之 7 成左右。

⁸ 2022 年日本 65 歲以上之就業人數較 2021 年增加 3 萬人，達到 912 萬人，刷新 1968 年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全球的老年人就業率亦呈現出上升趨勢，在 G7 中日本為 25.2%，比例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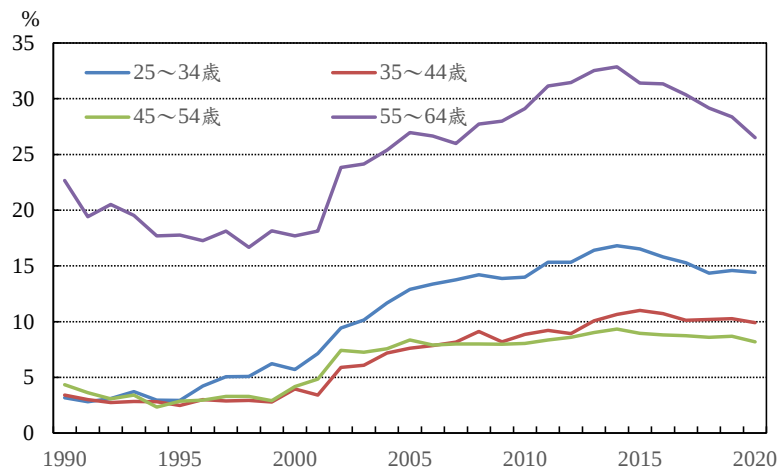
圖 6 日本高齡者及青壯年所得吉尼係數之變化



附註：資料公布至 202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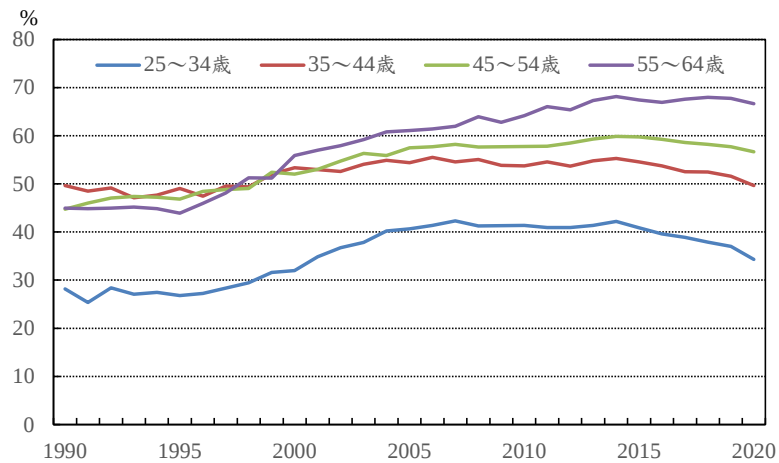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所得再分配調查報告」

圖 7 日本男性年齡別非正式僱用之比重



資料來源：總務省「勞動力調查」

圖 8 日本女性年齡別非正式僱用之比重



資料來源：總務省「勞動力調查」

若根據總務省之「就業結構基本調查」，35~49 歲男性正式僱用勞工之未婚比例為 23%，非正式僱用勞工之未婚比例則高達 64%。據此推測，未婚之非正式僱用勞工因薪資水準較低，與父母同住的人數不少。未來若父母亡故，他們將成為低所得家庭之戶長，將導致青壯年齡層所得差距擴大的問題進一步凸顯出來⁹。

參、COVID-19 疫情造成日本之所得差距再度擴大

2020 年爆發 COVID-19 疫情大流行，隨著疫情發展，全球所得差距均出現擴大現象。日本政府針對 COVID-19 疫情造成所得差距擴大之問題，聚焦對貧困者之緊急經濟援助措施，暫時擱置以長期觀點處理所得差距問題。後 COVID-19 時代，藉由執行適當的政策，將所得擴大重分配給具有高消費傾向之低收入階層，以矯正疫情期間所得差距惡化的現象，係驅動日本經濟成長之重要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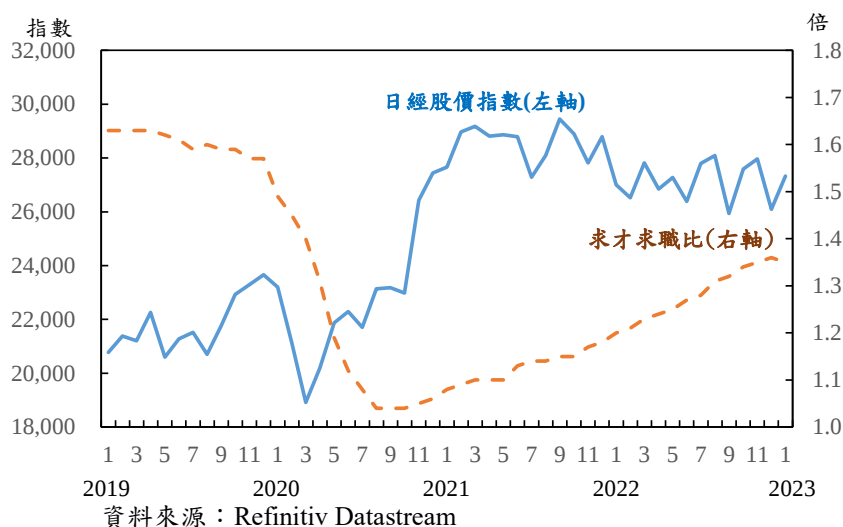
一、兩類型的落差擴大導致所得差距惡化

伴隨 COVID-19 疫情之發展，3 年來大致可觀察到兩類型的落差擴大現象，導致所得差距惡化，包括（1）股票市場與實體經濟復甦之落差，以及（2）行業別間復甦之落差。

有關股票市場與實體經濟復甦之落差，係經濟復甦初期所產生的資產效果所造成之落差，而此一現象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更為明顯。以日本為例，股票市場自 2021 年第 1 季開始復甦，且迅速超越 COVID-19 疫情之前水準；惟實體經濟之復甦則仍遠落後於疫情前水準，此可從求才求職比之緩慢變化看出，截至 2023 年第 1 季仍遠低於 2019 年第 1 季之水準（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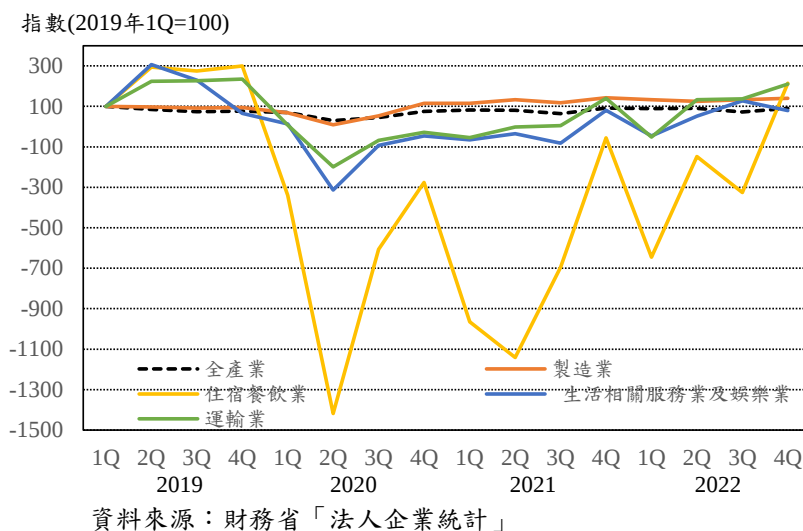
⁹ 參考井上誠一郎（2020）。

圖 9 COVID-19 疫情期間日經指數及求才求職比之變化



第二個導致所得差距擴大之原因係行業別間復甦之落差，此係 COVID-19 疫情期間特有的現象。圖 10 顯示行業別營業利益之變化。若以 2019 年第 1 季之營業利益水準為 100，可觀察到在感染傳播的初期階段（2020 年第 2 季），因對人員移動限制，導致所有行業的經濟活動停滯不前。惟隨著對病毒認識的進步及疫苗加速接種，2021 年第 4 季全產業之營業利益已大致恢復至疫情前的水準。其中，製造業業績因國外經濟復甦而快速回升至疫情前水準。惟在人員移動限制及提供面對面服務受限之運輸及服務業業績復甦，則明顯遲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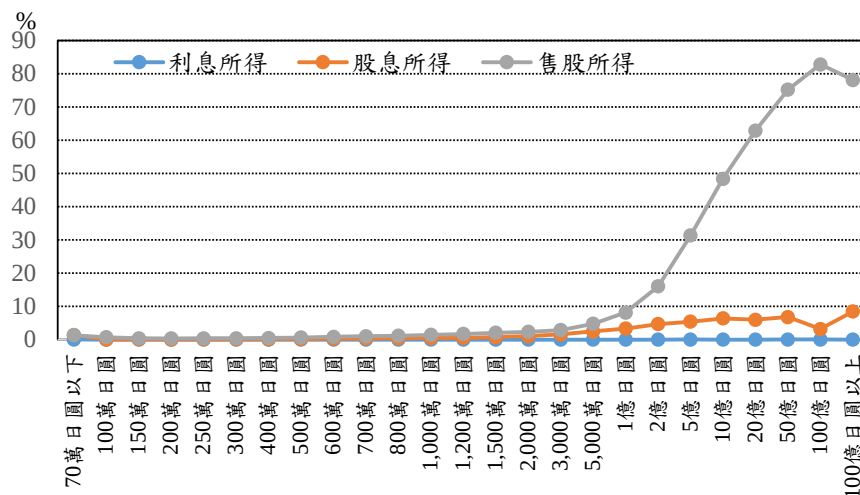
圖 10 日本行業別營業利益之變化



二、疫情對高所得與低所得階層產生非對稱性之影響

根據國稅廳「申告所得稅標本調查」資料顯示，所得愈高的階層，其金融所得占比愈高，因此在 COVID-19 疫情緩和，景氣逐漸復甦，且股票市場領先大漲時，所獲得的利益愈大（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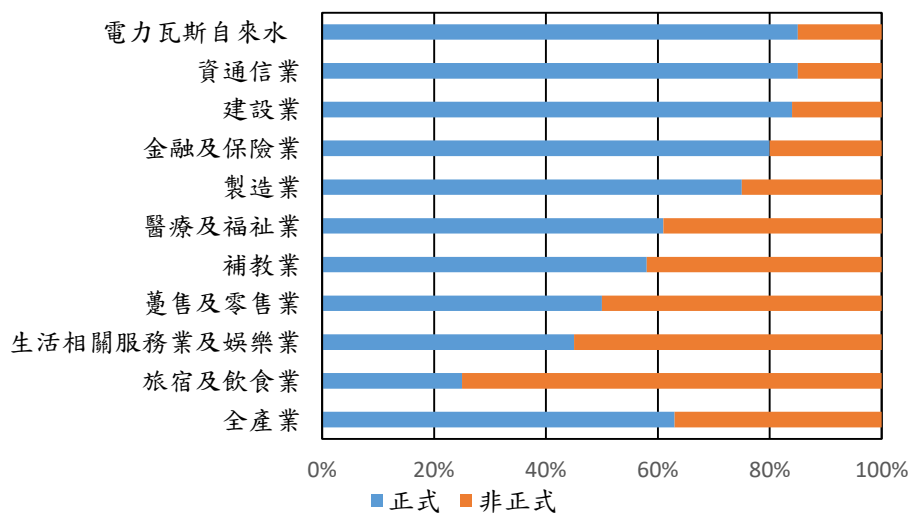
圖 11 日本各所得階層之所得中金融所得之占比（2022 年）



資料來源：國稅廳「申告所得稅標本調查結果」

總務省「勞動力調查」則顯示，屬於較低所得階層之非正式僱用勞工比重較高的行業例如旅宿及餐飲業、生活服務業及娛樂業，與易受 COVID-19 疫情影響之行業呈現高度重疊（圖 12）¹⁰。

圖 12 產業別之僱用型態別之占比（2022 年）



資料來源：總務省「勞動力調查」

¹⁰ 參考照山博司、木村匡子 (2022)。

因此，伴隨 COVID-19 疫情之發展，股票市場與實體經濟之落差，以及行業別間之落差，導致經濟呈現「K 型」復甦之兩極化現象，低所得階層與高所得階層之處境恰好相反，低所得者愈貧窮，高所得者愈富有，導致所得差距擴大問題惡化¹¹。

浦川邦夫(2021)根據總務省「家計收支調查」資料為基礎進行分析，探討 COVID-19 對各所得階層影響之情況。如表 1 所示，全體平均年所得從 2019 年之 514 萬日圓小幅成長至 2020 年之 516 萬日圓，主要是受第五分位高所得階層年均所得增幅超過 1%之影響。惟年所得第一分位及第二分位即收入最低的 40%階層之平均年所得，則呈現減少，致基尼係數由 0.346 升至 0.351。

表 1 日本家庭所得五等分位分配狀況

單位：萬日圓

年	平均	I	II	III	IV	V	基尼係數
2019	514	167	298	423	613	1,072	0.346
2020	516	164	294	423	613	1,085	0.351
變化率	0.4%	-1.8%	-1.3%	0.0%	0.0%	1.2%	1.4%

資料來源：浦川邦夫 (2021)

三、後 COVID-19 時代物價高漲對低所得家庭之影響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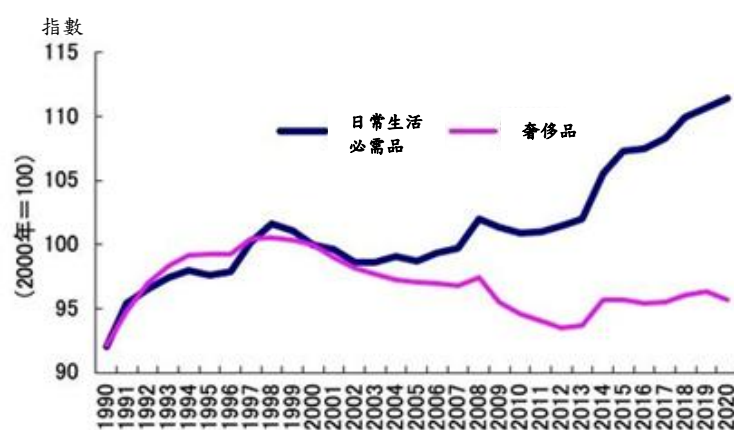
過去 20 年，在全球化、技術革新及非正式僱用等三大趨勢之發展下，中、低所得階層之貧窮化，與能源、食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同時發生，產生所謂的「壓榨通膨」(screwflation)現象。「壓榨通膨」係對中、低所得階層之生活壓榨(screwing)與通貨膨脹(inflation)結合之新造詞，此一現象亦導致日本中、低所得家庭之實質購買力下降。後 COVID-19 時代，特別是食品及能源等日常生活必

¹¹ 參考高見具広、山本雄三 (2022)、吉田一貴 (2021)及大久保敏弘 (2020)。

需品價格節節上漲帶動通膨持續上揚，導致「壓榨通膨」現象更加嚴峻¹²。

若將消費者物價指數區分為日常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水電等公用事業費用、服裝及鞋類、交通及醫療保健等）及奢侈品（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外之商品及服務）兩類觀察，日本自 2014 年以來奢侈品之價格大致持平，惟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則呈加速上漲的趨勢¹³（圖 13）。

圖 13 日本之日常生活必需品與奢侈品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資料來源：轉引自永濱利廣 (2021a)

根據總務省之「家計調查」資料，低所得家庭消費支出中日常生活必需品占比為 61.4%，奢侈品為 38.6%；高所得家庭消費支出中日常生活必需品占比降至 52.0%，奢侈品則上升至 48.0%（表 2）。因此，在後 COVID-19 時代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大幅上漲之情況下，低所得階層特別會感受到生活負擔加重，從而抑制購買力。

¹² 參考永濱利廣 (2021a)。

¹³ 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持續上漲之原因，大致包括（1）伴隨新興國家人口增加及所得水準提高而來之需求增加，導致進口商品之價格上漲；（2）先進國家大規模寬鬆貨幣導致投機資金流入國際商品市場，以及（3）異常氣候與新興國家之城市化導致農業用地減少，農作物產量下降等。

表 2 日本低所得及高所得家庭消費支出結構之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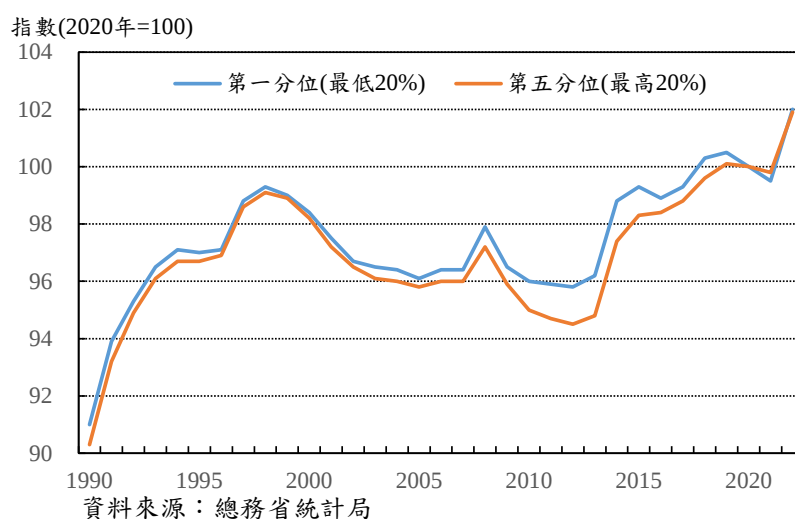
%

消費支出	全體平均	低所得家庭	高所得家庭
日常生活必需品(食品)	20.7	23.5	19.6
日常生活必需品(食品以外)	14.5	16.5	13.8
日常生活之服務類商品	19.1	21.4	18.6
合計	54.3	61.4	52.0
奢侈品	13.1	11.1	15.4
奢侈之服務類商品	22.7	19.3	26.4
合計	35.8	30.4	41.8
其他(交際費、支援生活費等)	9.9	8.2	6.2

資料來源：內閣府 (2023)

若觀察年收入最高 20%家庭之消費者指數作為高所得階層之物價，以及年所得最低 20%家庭之消費者指數作為低所得階層之物價，亦可發現低所得階層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自 2000 年代後期起即持續高於高所得階層，並於 2010 年代初期奢侈品價格下跌時，差距擴大的幅度達到最大（圖 14）。

圖 14 日本所得階層別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為阻止後 COVID-19 時代之物價高漲，促使低所得階層與高所得階層之所得差距進一步擴大，日本政府之因應措施包括（1）建構一個中小企業能夠容易進行價格轉嫁的商業環境，以確保為勞工加薪所

需要的資金¹⁴；（2）積極協調資方提高最低工資；（3）運用補助金或減免稅負等政策獎勵企業加薪，以及將非正式僱用勞工轉為正式僱用等¹⁵。

肆、日本所得差距擴大對經濟產生制約及其因應對策

長期以來各界對所得差距擴大對經濟成長之影響的研究結果顯示，正、反兩面均有，尚未達成普遍的共識。惟近年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所得差距擴大將對經濟成長動能產生負面的影響。

一、所得差距擴大主要透過四個途徑影響經濟成長動能

所得差距擴大將影響未來經濟成長動能，主要係經由對以下四個途徑之影響¹⁶：

（一）社會穩定

所得差距擴大可能導致社會動盪與不滿之情緒增加。社會穩定對於經濟成長至關重要，社會動盪與不穩定將影響企業信心而導致投資減少、民間消費減少，以及生產活動萎縮。

（二）購買力分配

少數人擁有大部分的所得或財富，廣大的社會大眾之購買力將相對減少。因為一般消費者無法承擔較高價的商品或服務，將導致企業銷售下降，進而影響經濟成長動能。

（三）教育機會

¹⁴ 中小企業廳自 2021 年 9 月起，為使下游中小企業更容易進行價格談判，設定每年之 9 月與 3 月為「價格談判促進月」，並強化相關支援措施，例如新設「價格轉嫁支援窗口」，傳授包括成本估算在內的價格談判基礎知識。利用「價格談判促進月」的機會，協助中小企業要求購買者將原材料等成本增加部分加入交易價格中。之後，並對 30 萬家中小企業進行後續調查，以瞭解價格談判與價格轉嫁之實際情況。根據後續調查結果，鎖定價格談判及轉嫁情況不佳的購買者，將根據「中小企業振興法」對其提出指導與建議案。

¹⁵ 參考內閣府 (2023)。

¹⁶ 參考井上誠一郎 (2020)。

所得差距擴大可能導致教育機會不平等。若教育機會受限，將影響人力資源之培養及人才流動，勞動力之技能水準及生產力提升可能受到影響，進而阻礙經濟成長動能。

（四）投資環境

所得差距擴大可能導致資本集中，將限制中小企業及創新企業之發展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創新能力與經濟成長動能將可能受到限制。

二、IMF 及 OECD 研究指出所得差距擴大將不利經濟成長

IMF (2015)認為，所得差距會抑制經濟成長及降低成長之可持續性，惟若所得重分配政策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將可能降低對經濟成長產生之負面影響¹⁷。IMF 另一份報告進一步指出，若低所得階層與中產階層之所得份額上升 1 個百分點，五年內該國之 GDP 成長率將提高 0.38 個百分點；惟若高所得階層所得份額上升 1 個百分點，GDP 成長率將下降 0.08 個百分點¹⁸。IMF 建議，解決所得差距擴大的問題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之方法，適當政策取決於各國體制環境。在先進經濟體，政策宜側重提高人力資本與技能之改革，同時提高租稅制度之累進性；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則宜確保金融深化能伴隨更大的金融包容性，以及為降低非正式僱用創造誘因之相關措施至關重要。

OECD (2014)亦認為，所得差距擴大加劇與高所得階層所得份額飆升有關，主要原因仍在於低所得階層所得在經濟繁榮時期之所得成長通常較慢，惟在經濟低迷時期則首當其衝快速下降。所得差距擴大之趨勢將抑制經濟成長動能，惟若適當地實施租稅政策及所得移轉等政策，將可減輕不利影響¹⁹。作為因應所得差距擴大之政策，僅重視

¹⁷ 參考 Ostry et al. (2014)。

¹⁸ 參考 Era et al.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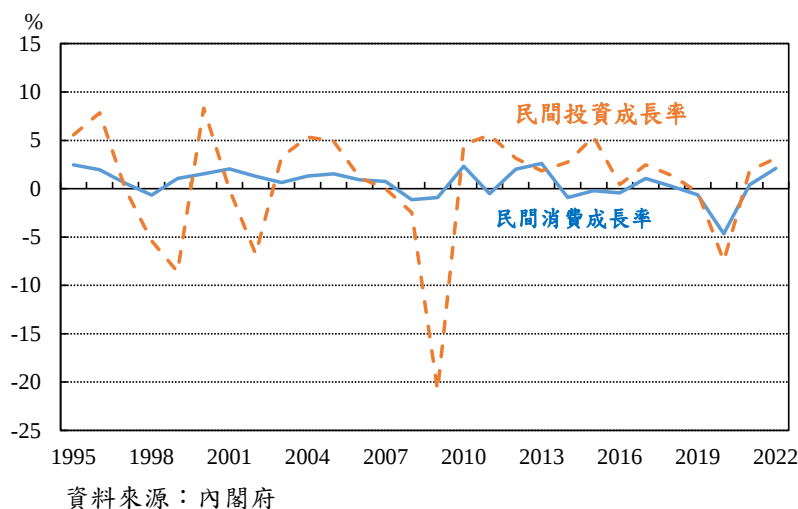
¹⁹ 參考 Cingano, Federico (2014)。

現金移轉支付等防貧措施還不夠，需積極思考擴大優質的教育培訓制度、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之可能性。

三、日本所得差距擴大導致民間消費持續疲弱而影響經濟成長動能

觀察日本所得基尼係數最初上升之 1990 年代中期起民間消費金額年增率之變化，可發現成長動能持續疲弱不振，特別在 2007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加上戰後第一波嬰兒潮「團塊世代」開始大量退休²⁰，高齡者可支配所得大幅縮減，導致消費能力下降之情況愈加嚴峻（圖 15）。2007 年至 COVID-19 爆發前之 2019 年之 13 年間，儘管實施「安倍經濟學」，民間消費成長率仍有 7 年陷入負成長；民間投資成長率亦伴隨民間消費萎靡不振而走勢疲弱（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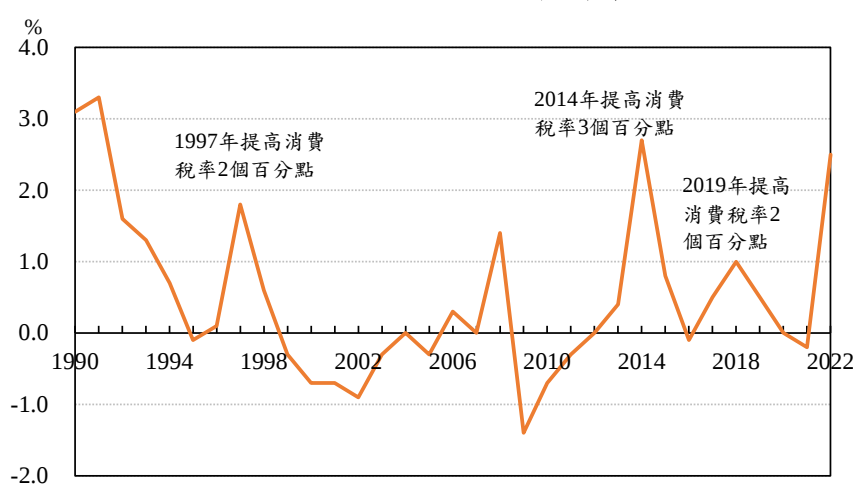
圖 15 日本民間消費及投資成長率之變化



觀察同時期之消費物價指數年增率之變化，剔除歷次調高消費稅稅率影響後之消費物價指數年增率，亦呈現明顯的下滑趨勢，大致僅維持於 0% 左右，且有 4 年陷入負成長（圖 16）。

²⁰ 「團塊世代」係指二次戰後日本於 1947~1949 年出生之第一波嬰兒潮，每年有新生兒 270 萬（2022 年新生兒僅 77 萬），總計約 810 萬人，約占總人口之 2.7%，2007 年至 2009 年達到 60 歲，2012 年至 2014 年達到 65 歲。

圖 16 日本消費物價指數年增率之變化



資料來源：總務省統計局

四、日本採取因應措施降低所得差距大以促進經濟均衡發展

過度執行社會福利政策，可能導致勞工降低工作意願；過高的稅率則可能降低勞工與企業對工作與投資之意願，影響資源配置之效率，進而降低經濟成長動能。近年全球主要國家之財政狀況嚴重惡化，未來運用社會福利政策進行重分配之能力將受到限制，尤其是面臨嚴峻的少子高齡化的國家。因此，在執行所得重分配政策之前，善用市場機制運用事前分配（pre-distribution）政策處理所得差距擴大的問題，成為較佳的政策選擇²¹。近年日本政府擬訂政策時亦朝此方向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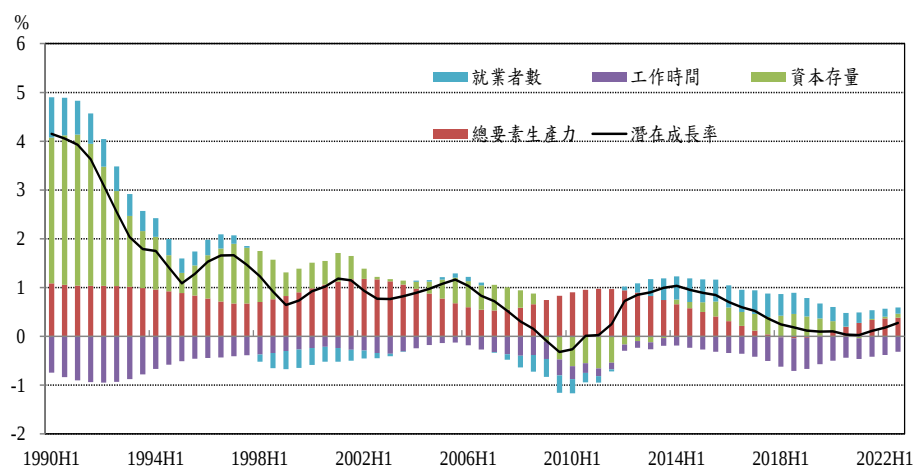
（一）解決總需求不足問題仍係縮小所得差距之最優先課題

如圖 17 所示，根據日本央行推估之日本潛在經濟成長率，自 1990 年以來除受泡沫經濟破滅後資本存量明顯減少影響之外，亦受到人口

²¹ 參考 Diamond, Patrick and Claudia Chwalisz (2015)。「事前分配」(pre-distribution) 的概念越來越在政治經濟學引起關注。這個概念主要在關注國家如何改變市場機制運作結果之基本分配，以便不再單純依賴事後所得重分配來實現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因此，「事前分配」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手段，可以在傳統的福祉政策之外因應經濟與社會不平等，強調就業能力 (employability)、人力資本及技能 (human capital and skills)，以及設計與調整市場機制 (structuring markets) 以促進更大的公平。有關設計與調整市場機制之內容，例如強化工會及談判權力、實施法律及政策確保勞工的權益受到保護，以及支持社會企業與合作社，這些組織通常更注重社會目標和共享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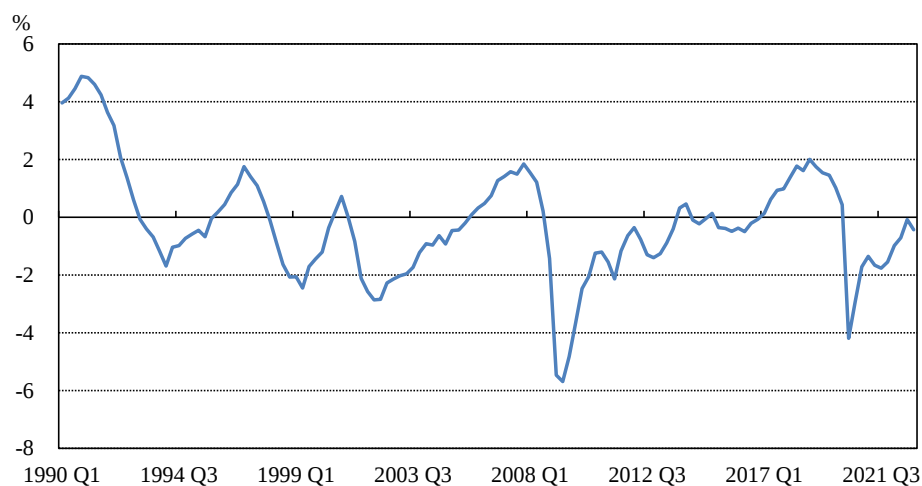
高齡化勞動力投入持續減少（包括就業者數及工作時間）之影響，而呈現一路下滑之趨勢。影響所及，不但所得差距擴大，最終需求亦持續萎縮，導致負的產出缺口擴大（圖 18）。2013 年「安倍經濟學」實施激勵高齡者及女性於婚後再就業之相關政策之後，就業者數才由減少轉為增加，一度成為帶動潛在經濟成長率回升之主要力量，產出缺口亦隨之由負轉正。

圖 17 日本之潛在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日本央行

圖 18 日本之產出缺口



資料來源：日本央行

受全球 COVID-19 疫情之衝擊，2020 年日本之產出缺口再度由正轉負，且所得差距再度惡化，成為國會之政治焦點。2021 年 10 月

岸田文雄競選首相前一度提出「無所得分配即無經濟成長」（日文：分配なくして成長なし）之經濟政策主張。之後，所得分配政策與經濟成長，何者應優先執行成為學者專家爭論的熱門議題。若考量當前日本經濟仍存在負的產出缺口之特殊情況下（圖 18），日本政府優先執行所得分配政策反而可能使得經濟成長停滯，恐有導致所得差距擴大之反效果。因此，優先考量執行擴大總需求之總體經濟政策，在儘快實現產出缺口由負轉正之後，再執行所得分配政策，似較能達到較佳的效果²²。岸田文雄正式就任首相後致力推動「新資本主義」，將經濟政策主張調整為「優先注重經濟成長再執行所得分配政策之良性循環」（日文：『成長と分配の好循環』の拡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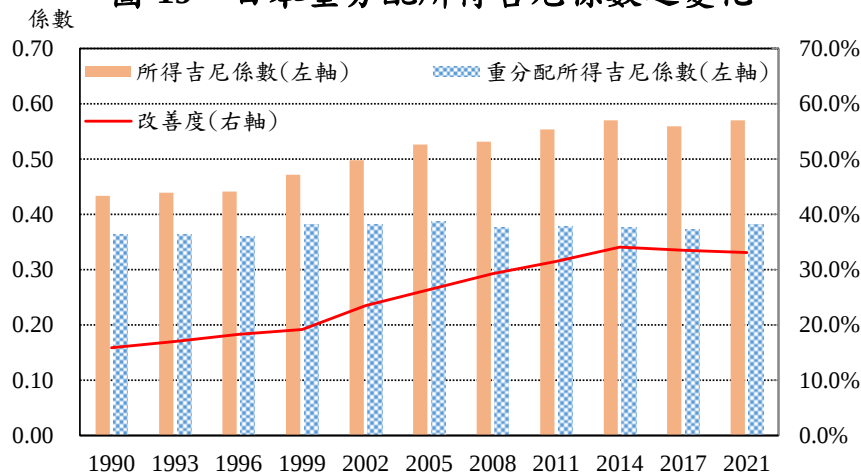
（二）運用社福制度及租稅制度改善所得重分配能已愈來愈困難

所得基尼係數係單純根據上年之所得計算得出，惟民眾實際上獲得的所得，須扣除稅金及社會保險費，再加上退休年金、醫療、照護、育兒津貼等社會福利所得。因此，將所得扣除稅金及社會保險費，再加上退休年金、醫療、照護、育兒津貼等社會福利之重分配所得基尼係數，更能貼近現實生活中民眾對貧富差距之感覺。由於社會福利制度與租稅制度發揮所得重分配功能，日本之重分配所得基尼係數於 2000 年代雖較 1990 年代上升，惟相對所得基尼係數之快速上升仍維持較平穩之趨勢（圖 19）。進一步觀察各年齡層之重分配所得基尼係數之改善狀況，高齡階層之改善程度最顯著（圖 20），主要係與公共及企業退休年金制度逐步完備密切相關²³。

²² 參考永濱利廣 (2021)。

²³ 參考厚生労働省 (2020)。

圖 19 日本重分配所得吉尼係數之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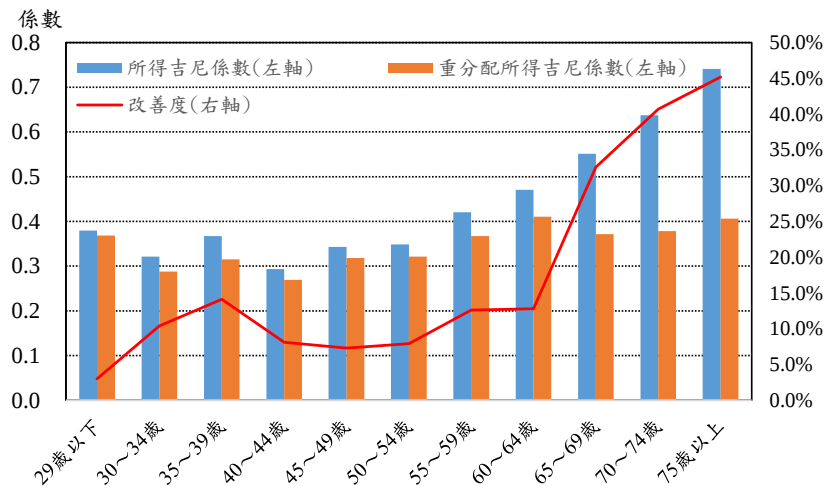


附註：1.資料公布至 2021 年。

2.改善度(%)之計算公式： $(\text{所得基尼係數} - \text{重分配所得基尼係數}) / \text{所得基尼係數} * 100$ 。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所得再分配調查報告書」

圖 20 日本各年齡層重分配所得吉尼係數之變化



附註：1.資料公布至 202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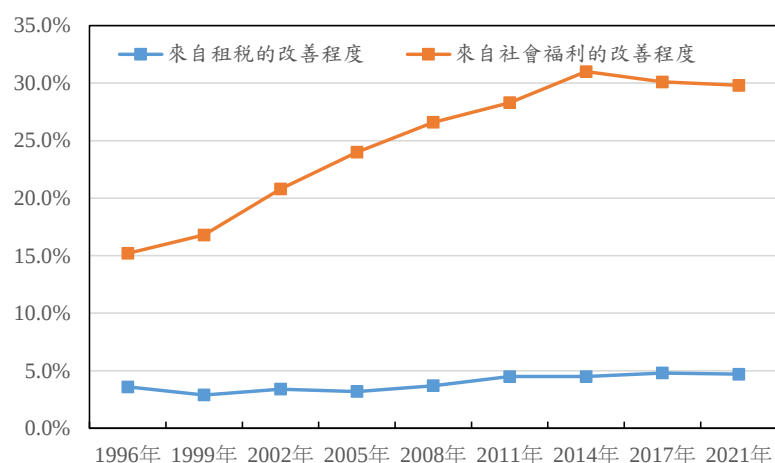
2.改善度(%)之計算公式： $(\text{所得基尼係數} - \text{重分配所得基尼係數}) / \text{所得基尼係數} * 100$ 。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所得再分配調查報告書」

將重分配所得吉尼係數之改善程度分為來自租稅及社會福利制度之影響來看，可發現主要係來自社會福利之改善（圖 21）。由於人口高齡化之影響，日本政府一般歲出中社會福利相關費用之占比由 2000 年之 35%擴大至 2023 年之 51%，超過 30 兆日圓，未來運用社

會福利制度矯正所得差距之能力愈來愈受到限制。因此，未來日本政府對社會福利制度之改革方針，將積極扶持民間福祉相關產業之發展，不僅依賴投入量之增加，亦需藉由生產力之提升。

圖 21 社會福利及租稅對重分配所得吉尼係數之改善程度



附註：1.資料公布至 2021 年。

2.改善度(%)之計算公式： $(\text{所得吉尼係數} - \text{重分配所得吉尼係數}) / \text{所得吉尼係數} * 100$ 。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所得再分配調查報告書」

為矯正所得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近年日本政府亦強化租稅制度改革，例如 2015 年提高所得稅與遺產稅之最高稅率，所得稅最高稅率由 40%提高至 45%，遺產稅最高稅率則由 50%提高至 55%，藉以增加高所得者負擔，而租稅對重分配所得吉尼係數之改善程度亦隨之微幅上升（圖 21）。財務省公布之國民負擔率亦顯示，社會保障負擔與租稅負擔相對國民所得（NI）之比率，自 2015 年之 42.3%提高至 2022 年之 47.5%²⁴。其中，社會保障負擔率由 17.1%升至 18.8%，上升 1.7 個百分點；租稅負擔率則由 25.2%升至 28.6%，上升 3.4 個百分點。

²⁴ 簡單地說，即 100 萬日圓收入中，需要繳納 47 萬 5,000 日圓作為稅金與社會保障費（包括健康保險與退休年金等），可支配收入為 52 萬 5,000 日圓。從 2022 年開始，「團塊世代」將陸續迎來 75 歲，社會保障費用很可能進一步膨脹。

（三）愈來愈重視運用事前分配政策來縮小所得差距

為降低伴隨高齡化而來之所得差距擴大對經濟成長影響，日本政府首先思考的課題是「如何提升中高齡者就業之策略」。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2014 年出版之「教育及技能 2.0：新的目標與創新的方法」書中提及，日本由公、私部門通力合作，提出促進中高齡者、女性就業策略，除建立完善的環境與制度外，更重要的是社會大眾應拋開年齡或性別的刻板印象。據此，岸田首相推動之「新資本主義」提出 5 年 1 兆日圓之預算，積極改革技能再培訓之教育訓練環境。

1. 積極改善高齡者之就業能力及環境

探討日本超高齡社會之特徵，就必須提及戰後第一波嬰兒潮「團塊世代」之高齡化及退休後再僱用的問題。「團塊世代」於 2007 年開始退休，對日本經濟及社會產生一連串重大的衝擊包括：（1）大量退休勞工導致勞動力減少，影響勞動市場的供需平衡；（2）技術傳承不足，導致組織或企業失去專業知識及專業技能；（3）企業需要籌措大量退休金，對企業財務狀況產生影響，以及（4）國內儲蓄率下降，對未來的投資及經濟成長之資本積累產生影響。因此，在少子高齡化造成年輕勞動力不足之勞動市場結構下，欲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就必須採取積極有效的對策激勵高齡者就業及僱用²⁵。

日本政府改善高齡者之就業能力及環境之策略大致包括：（1）強制退休年齡自 60 歲延長至 65 歲；（2）提供職場學習及適應新工作環境之補助措施；（3）非營利組織建立關於工作、技能及學習的資訊分享平台，讓高齡者可貢獻技能與經驗；（4）企業將工作型態多元

²⁵ 參考張瑞雄 (2010)。

化，或採彈性的工作輪調，以吸引高齡工作者，以及（5）教育體系提供公、私部門的終身學習方案等²⁶。

2. 擴大支援對青、壯年階層勞工（包括非正式僱用及失業勞工）之技能再培訓教育訓練

（1）執行現況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之浪潮中，傳統工作被新技術例如人工智能、機器人取代的可能性愈來愈高，勢必將嚴重衝擊中低所得階層勞工之就業與所得。因此，支援對中低所得階層勞工進行技能再培訓將變得更加重要，且可在協助產業結構轉型下發揮支撐經濟成長之作用。

目前日本政府主要依據僱用保險制度，除了對在職或失業勞工接受指定之技能再培訓教育訓練提供補助金之外，對配合實施之企業亦提供「支援人力資源發展補助金」。而且，對非正式僱用勞工於休假期間接受教育訓練之費用給予補助，並引進帶薪之「教育訓練休假制度」，對取得教育訓練休假之勞工給予補助等。

（2）未來之課題

2020 年於達沃斯舉行之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中提出「技能再培訓革命」（reskilling revolution）之概念，促使技能再培訓相關議題再度引起國際間關注。其主要目標為至 2030 年為 10 億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技能及工作之倡議，以獲取新技能以因應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相關的技術變革。據此，岸田首相推動之「新資本主義」提出 5 年 1 兆日圓之預算，計劃促使政府與產業界、大學合作，積極改革技能再培訓之教育訓練環境。具體來說，可分為以下 3 個重點項目²⁷。

²⁶ 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

²⁷ 參考日本經濟新聞（2022），「岸田首相の「日経リスキリングサミット」での発言要旨」，10 月 12 日。

第一、建立企業間及產業間勞動力順利移轉之機制，並對促進非正式僱用轉為正式僱用之企業，或積極接納轉業或接受勞工從事副業之企業擴大支援政策。

第二、為支援在職勞工在技能提升後能順利轉任更高薪的工作，將建立一個新制度提供專家諮詢、技能再培訓及工作轉換等一貫作業的全面性支援系統。

第三、為加強企業對勞工技能再培訓之支援，將提高對企業之補助金。

3. 協助中產階級擴大金融資產所得

日本個人金融資產高達 2,000 兆日圓，一半以上以存款及現金持有。相較於歐美國家，過去 20 年美國家庭金融資產成長 3 倍，英國成長 2.3 倍，而日本僅成長 1.4 倍²⁸。

2014 年日本政府為鼓勵更多民眾進行投資，推行小額投資非課稅制度「日本個人儲蓄帳戶」NISA（Nippon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截至自 2022 年已開立 1,839 萬個帳戶（約占總人口的七分之一），進行長期、分期及多元化的小額投資²⁹。岸田首相於 2022 年 6 月提出「金融資產所得加倍計畫」，期待藉由放寬 NISA 之投資限制，以及將有期間限制之優惠措施予以永久化，協助中產階級擴大金融資產所得³⁰，預計明（2024）年 1 月起，提高 NISA 之資本利得免稅額度，且取消原免稅期間限制，並擴大免稅投資額度（表 3）。

²⁸ 參考日本証券業協会 (2022)。

²⁹ NISA 於 2014 年 1 月開始實行，係提供個人投資者的稅制優惠制度。只要是居住在日本且年滿 20 歲人士，於 2014 年~2023 年的 5 年間，因投資股票、基金等而獲得股利、紅利等收益，可享受有每年 120 萬日圓的非課稅投資額度；每月定期定額 NISA 與標準 NISA 一樣，對象是居住在日本且年滿 20 歲人士，投資者可自由選擇運用標準或每月定期定額其中之一。每月定期定額 NISA 是支援長期、累積、分散的投資，雖然每年只有 40 萬日圓的非課稅投資額度，惟最長 20 年間可享受有非課稅優惠；未成年 NISA 是針對 0~19 歲的未成年者，最多 5 年可享用每年 80 萬日圓的非課稅投資額度，投資股票、基金等而獲得的股利、紅利等收益均是非課稅標的。

³⁰ 參考內閣府 (2022)。

表 3 日本個人小額投資免稅制度(NISA)

	現行制度			2024 年新制	
帳戶分類	標準 NISA	每月定期定額 NISA	未成年 NISA	每月定期定額 NISA	成長型投資 NISA
申請截止期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不限	不限
免稅期間	5 年	20 年	5 年	不限	不限
年度免稅投資額度(日圓)	120 萬	40 萬	80 萬	120 萬	240 萬
總免稅投資額度(日圓)	600 萬	800 萬	400 萬	1,800 萬	1,200 萬
適用投資標的	上市股票、ETF、REITs、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上市股票、ETF、REITs、股票基金	基金	上市股票、基金
適用民眾	成年民眾	成年民眾	18 歲以下民眾	成年民眾	成年民眾

資料來源：日本金融廳

伍、結語與對我國之啟示

一、結語

日本過去三年歷經 COVID-19 疫情，俄烏戰爭、全球供應鏈斷鏈危機，除波及生產及商業活動之外，其所衍生之由能源及食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飆漲帶動之供給面高通膨現象，讓原先已飽受高齡化現象所苦之低所得階層陷入前所未有的生活困境，亦造成所得分配差距再度擴大。針對 COVID-19 疫情造成所得差距擴大之問題，日本政府聚焦對貧困者之緊急經濟援助措施，暫時擱置以長期觀點處理所得差距之問題；惟亦體認到在後 COVID-19 時代，如何靈活運用所得重分配政策或事前分配政策，及早改善所得差距擴大之現象，不僅在確保社會公平性與貧困對策方面相當重要，並可減緩財政狀況惡化的速度，從而維持日本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長期活力。

近年日本政府積極運用尊重市場機制之事前分配政策，以減緩所得差距擴大的速度。例如，改善高齡者及婦女之就業能力及環境、強化青壯年勞工之技能再培訓教育、敦促企業遵循「同工同酬指南」改善非正式僱用之差別待遇以調整市場機制，以及擴充個人小額投資免稅制度（NISA）協助中產階級擴大金融資產所得。針對近年青、壯年階層所得差距不斷擴大之趨勢，日本政府加強支援對青、壯年階層之非正式僱用勞工與求職者之技能再培訓教育訓練投資，將此視為執行事前分配政策之最優先政策。為促使產官學合作加速改革技能再培訓之教育訓練環境，日本政府已提出 5 年 1 兆日圓之大規模預算，未來其執行之詳細內容與成效，值得持續追蹤與關注。

二、對我國之啟示與建議

我國於 2021 年之所得差距，由 2020 年之 6.12 倍增至 6.15 倍，不但持續 3 年上揚，亦創下近 9 年來最大；吉尼係數亦達 0.341，創近 10 年來最高，反映所得差距似有加速擴大的跡象。若依所得高低排序五等分位，最窮的後 20% 家庭裡有 6 成是老年家庭。再從另一角度觀察，2021 年 214 萬戶老年家庭落在後 20% 低所得組之比率亦高達 5 成，顯示約有半數老人的生活陷入困窮。

2025 年台灣亦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卻有逾半老人家庭落在低所得組，當高齡意味著將陷入貧窮，而貧富差距擴大將為社會帶來動盪與不穩定。根據國發會之人口推估報告，伴隨少子化，10 年後大約在 2035 年，我國老年人占總人口比重將達 27.7%，超過美、英、德、法；20 年後亦即 2045 年，全國人口中逾三分之一是老人，老化速度將超乎想像。以下，擬根據本文之分析，提出以下四點建議供參。

(一)宜事先推估超高齡社會及史上最大退休潮對台灣民間消費之可能影響，俾便擬訂因應對策

日本各界對 2007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加上戰後第一波戰後嬰兒潮「團塊世代」退休，對民間消費可能產生之影響高度重視。根據內閣府（2016）之分析，日本高齡者家庭消費支出較其他年齡層低，對民間消費造成不小影響，估算相較 2002 年，2015 年之全體消費支出約下降 3%。因此，建議在快速高齡化之情況下，未來在判斷民間消費基調時，需考慮納入人口結構之變化。

台灣之高齡化現象對未來經濟成長動能之影響恐不亞於日本。除 2025 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之外，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出現過二波嬰兒潮，最大一波是 1958 年至 1966 年，9 年間出生人口達 378 萬人。本（2023）年起陸續到達法定退休年齡的 65 歲，將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退休潮。惟 10 年內新增工作年齡人口（15~64 歲）僅 181 萬餘人，落差近兩百萬人。

彙整 2016 至 2022 年各年齡層之就業人數（詳附表），15~24 歲年齡層之就業人數自 2020 年起呈現顯著的下降趨勢，2022 年較 2019 年大幅下降約 11.6%；另一方面，55~64 歲之就業人數則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2022 年 55~64 歲就業人口達 168.2 萬人，較 2016 年成長 12.8%。由於 55~64 歲的就業人口將於未來 10 年內陸續退休，惟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之勞參率僅 9.76%，遠低於日、星、韓之 25%至 35%。在新進就業人口減少，退離人員增加之背景下，台灣經濟將迎來史無前例的就業供給面之制約。

此類人口結構之轉變，對消費需求面之制約亦不可忽視。根據主計總處「111 年家計調查報告」，65 歲以上高齡者平均每戶每年年消

費支出約 584,366 元，較 55~64 歲年齡層每戶之 853,593 元大幅減少約 269,227 元；由於高年齡者多為一戶之戶長，若將該減少金額乘以退休人口並調整該年齡層戶口人數，預估未來 9 年間民間消費減少金額約為 1,635 億元³¹。影響約為 2022 年民間消費 10 兆 3,617 億元之 1.6%，將對民間消費產生不可逆之影響。

（二）台灣高齡者勞參率仍低，需致力改善就業能力及環境，激勵自發性延長就業，緩和對就業供給面及消費需求面之制約

根據本文分析日本之經驗顯示，高齡化引起的所得分配差距擴大與經濟成長停滯此二現象，容易相互影響而形成惡性循環，將抑制未來經濟成長動能。我國宜借鏡日本政府改善高齡者之就業能力及環境之策略，激勵自發性延長就業，不但可防範所得差距加速擴大，亦可維持經濟發展所需的龐大人力需求，並有助於維持民間消費動能。

促進高齡者就業策略需要政府、企業及社會各方共同努力，以建立一個更能包容與支持高齡者參與勞動市場之環境，除可參考日本運用公共政策包括減稅、補貼或其他激勵措施，鼓勵企業招聘與保留高齡員工外，值得借鏡之處尚有（1）加強高齡者技能再培訓計畫，提高就業競爭力；（2）提供靈活的工時及工作環境，例如部分時間工作、遠程工作或彈性工作時間等；（3）制訂工作規範，鼓勵僱用差異化，重視年齡多樣性，消除對高齡者之歧視；（4）政府制訂政策協助雇主降低因僱用高齡者面臨的風險；（5）推動跨代團隊合作，以及（6）透過宣傳與教育活動，提高社會對高齡者價值與貢獻之認識等。

（三）後 COVID-19 時代生活必需品價格高漲，可借鏡日本將政策重點聚焦協助中小企業加薪以緩和對低所得階層生活之衝擊

³¹ 計算公式為 1,682,000 人(55~64 歲年齡層人口)/2.77(人/戶)×269,277(元/戶)=1,635 億元。

在全球化、技術革新及非正職僱用等三大趨勢快速發展下，中產階級之貧困化與能源、食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揚同時發生，產生所謂的「壓榨通膨」現象。我國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亦顯示，過去 10 年（2012 年至 2022 年）低所得家庭 CPI 由 95.9 升至 108.1，大漲 12.8%，同一期間高所得家庭僅漲 9.8%，全體家庭則漲 10.7%³²。長期而言，低所得家庭所面對之物價壓力明顯較大，而食物類價格 10 年大漲 27%應是主因。

因此，除了直接針對低收入戶實施補助措施之外，似可參考日本之經驗，藉由政策協助中小企業建構一個能夠容易進行價格轉嫁的環境來確保為勞工加薪所需要的資金，並積極協調資方持續提高最低工資，以及積極放寬運用減免稅負獎勵中小企業加薪之適用條件等方式亦可加以考慮³³。

（四）台灣受 COVID-19 疫情影響薪資 M 型化更加嚴峻，宜加強支援服務業技能再培訓，防範青壯年所得差距惡化

日本過去積極改善高齡者之就業能力及環境，近年政府大規模投入資源與產業界及大學合作，積極改革青壯年階層之技能再培訓之教育訓練環境，致力提升勞動生產力，體認到唯有如此才能持續提高實質薪資成長，改善青壯年階層所得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

我國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薪資 M 型化之情況亦更加嚴峻。青壯年高薪階級集中於可進入高科技產業之極少數人，惟大量投入服

³² 低所得家庭的消費中高達六成花在食物、居住（高所得者僅四成），而近年這兩項漲幅較大，經加權平均之後，推升了低所得家庭的通膨率。

³³ 在租稅抵減部分，我國現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已提供經濟景氣指數達一定情形下（失業率連續 6 個月高於 3.78%），中小企業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 5 萬元以下的基層員工加薪，可享有薪資費用抵減率 130%的租稅優惠。未來似可研議「起動要件下修」以及「抵減比率上修」兩個方向。前者希望把失業率連 6 個月標準降低，讓企業可以更容易適用。後者藉由調高抵扣比例，讓企業更願意替員工加薪。例如，抵減比率從 130%提高至 200%，實施期間延長到 2031 年 5 月 19 日；另對年齡 29 歲以下年輕人，抵減比率從 150%提高到 220% 等。參考中時新聞網 (2023)，「鼓勵加薪 中小企抵減稅額 可望拉高」，10 月 25 日。

務業之青壯年卻因低附加價值及低學習曲線，低薪及失業之情況更加惡化，造成青壯年所得差距擴大。在此背景下，亟需加強支援對青壯年求職者及非正式僱用勞工之技能再培訓教育資源之投入³⁴。日本政府規劃服務業技能再培訓教育之重點內容或可參考，例如善用智慧資本、驅動文化資產、科技資訊與環境資源，作為創新與加值之元素，促使服務業價值提升。

³⁴ 我國雖有「終身學習法」以及「機關或雇主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獎勵辦法」等相關法源，對於企業單位訂定員工帶薪學習相關規定、每年給予員工固定公假進修，以及每年編列經費辦理或補助員工進修等三大評審項目，行政主管機關得衡酌機關或雇主所營事業之規模及特性進行分組審查，擇優錄取並評定其等級。但此辦法仍未訂出具體的獎勵基準，如企業規模、公假人數與天數，以及實際經費運用等；此外，對於獎勵亦不夠具體，使得辦法流於形式。參考蔡培村、武文瑛 (2007)。

附表 台灣各年齡層之就業人數

(單位：千人)

年齡層 年	15-24	25-39	40-54	55-64	65 歲以上
2016	814	4496	4207	1491	258
2017	831	4463	4262	1524	272
2018	860	4445	4298	1551	280
2019	872	4434	4325	1579	290
2020	850	4350	4355	1627	321
2021	812	4233	4390	1663	350
2022	771	4142	4443	1682	380

資料來源：勞動部

參考文獻

- 張瑞雄 (2010) ,「日本高齡者就業的現象與問題」, 台灣勞工季刊 , 12 月。
- 連欣儀 (2014) ,「美國所得不均問題與改善方案之探討」,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六十六輯, 6 月。
- 國發會人力發展處 (2015),「推動「改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縮減所得差距」, *Taiwan Economic Forum*, Volume 14, Number 1。
- 蔡培村、武文瑛 (2007) ,「我國回流教育政策發展回顧與檢討」, 教育實踐與研究 , 第 20 卷第 1 期, 3 月。
- Cingano, Federico (2014), “Trends in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163.
- Diamond, Patrick and Claudia Chwalisz (2015), “The Predistribution Agenda : Tackling Inequality and Supporting Sustainable Growth,” September.
- Era, Dabla-Norris, Kalpana Kochhar, Frantisek Ricka, Nujin Suphaphiphat, and Evridiki Tsounta (201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June.
- Forbes, K. J. (20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4, September.
- IMF (2017), “Understanding the Downward Trend in Labor Income Share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pter 3, pp.121-172 April.

Kitao, Sagiri and Tomoaki Yamada (2023), “The Time Trend and Life-cycle Profiles of Consumption,”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3-E-036, May.

Ostry, Jonathan D.,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G. Tsangarides (2014),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February.

井上誠一郎 (2020), 「日本の所得格差の動向と政策対応のあり方について」, *RIETI Polic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P-016, 経済産業研究所, 6 月。

浦川邦夫 (2021), 「コロナウィルス感染症と日本の経済格差—「家計調査」の結果(2019 年、2020 年)による考察—」, *季刊個人金融*, 夏季號。

大久保敏弘 (2020), 「コロナショックが加速させる格差拡大」, *NIRA オピニオンペーパー* No. 53, NIRA 総研, 9 月。

厚生労働省 (2020), 「令和 2 年版厚生労働白書—令和時代の社会保障と働き方を考える—」, 10 月。

高見具広、山本雄三 (2022), 「コロナ禍における所得変動と所得格差」, *JILPT Discussion Paper* 22-03, 2 月。

照山博司、木村匡子 (2022), 「新型コロナパンデミックと日本の家計行動—就業・消費・家庭」, *経済分析* 第 204 号, 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

内閣府 (2016), 「～人口構造の変化が個人消費に与える影響について～」, *経済財政分析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DP/16-0412, 11 月。

内閣府 (2022), 「日本経済 2021—2022～成長と分配の好循環実現に向けて～」, 2 月。

内閣府 (2022), 「新しい資本主義のグランドデザイン及び実行計画」, 10 月 12 日。

内閣府 (2023), 「家計の実質消費支出の動向について」, 今週の指標 No.1304, 4 月 7 日。

永濱利廣 (2021a), 「中間層貧困化と物価上昇、「スクリーフレーション」が阻む景気好循環」, *DIAMOND online*, 9 月 13 日。

永濱利廣 (2021b) 「所得格差に対する誤解～再分配後の所得格差はむしろ縮小。再分配よりも優先されるパイの拡大～」, *Economic Trends／マクロ経済分析レポート*, 第一生命経済研究所, 9 月 21 日。

日本証券業協会 (2022), 「中間層の資産所得拡大に向けて～資産所得倍増プランへの提言～」, 7 月 20 日。

深澤映司 (2015), 「格差と経済成長の関係についてどのように考えるか」, *レファレンス* 平成 27 年 2 月号。

吉田一貴 (2021), 「コロナ禍における所得格差の実態～格差の固定化を防ぐための施策の必要性～」, *経済のプリズム* No 206, 参議院事務局, 11 月。